

回憶胡喬木

王夢奎

一

早就讀過胡喬木的文章和詩詞，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第一次見到他。

當時我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四月十六日接到辦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員以上人員到南海西樵聽胡喬木的報告。我本來不喜歡聽報告，聽了胡喬木的報告，還是在辦公室聽，聽完後，胡喬木說：「這也是一次聽了胡喬木的報告。」

胡喬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詳，在兩個小時的講話中一直端坐着，似乎連呼吸都不曾動過。他不善演講，慢聲細語，缺乏抑揚頓挫，像一篇平鋪直敘的文章，不能引人入勝。當時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這篇講話經過整理，收入稍後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論文集。我讀了一遍，竟和聽講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講的觀點或許有些可以商榷之處，但整個報告思路清晰，有許多獨到見解，顯示了他理論功底的深厚和思維的縝密。他所講的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對於社會主義觀念的不同理解，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開端的設想和推測，都使人有豁然開朗之感。他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不斷地總結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不斷補充、修改，個別原理要修改，更不說具體提法了。」現在這已經成為常識，但胡喬木是在一九八一年講的，當時人們的思想還很禁錮。那時他正在負責起草《關於建國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講的大概是起草過程中的一些想法。

二

第一次同胡喬木面對面談話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當時我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副組長，同胡喬木南長街住處所談關於經濟組副組長的問題。胡喬木的談話內容，我後來在《胡喬木回憶錄》中，以《胡喬木與我》為題，寫了一篇長文。胡喬木的談話，我後來在《胡喬木回憶錄》中，以《胡喬木與我》為題，寫了一篇長文。

胡喬木說，這幾年經濟上的轉變是非常大的，但還沒有文章說明這種轉變。這類文章不算多，大抵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的說明，概括性的比較少。要對改革作一種概括，在關鍵問題上講些道理出來，說明我們的步驟和成功，以及為什麼會取得成功。他把當時的經濟改革概括為：城鄉都要擺脫「左」的束縛，城鄉都有多種經濟形式；城鄉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城鄉的改革都衝破了原來管理上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談得比較多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問題，講了從農業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的歷史過程。胡喬木說，要從理論上說明，承包制為什麼有那麼大力量，不能僅限於分配方面。談到當時還在討論的實行承包制後農民能否擁有汽車、拖拉機等大型生產資料的問題，胡喬木說，他還沒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實行承包制，對社會主義是個進步而不是退步，農民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們要承認這一點，活人不能讓尿憋死。

胡喬木說到近幾年自己沒有寫出有分量文章的原因。據他說，胡喬木對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寫的關於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文章，以及後來關於按勞分配的文章，都比較滿意，因此也沒有那樣有分量的文章。每年都有兩篇重要報告或講話，其中包括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二大報告。身體差了，幹勁這個，幹勁那個，很難有時間寫長東西。他說是的實情，也流露出無奈和煩惱。

三

就在這次談話後不久，《紅旗》雜誌向我約稿，我寫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發表在一九八四年第十五期。文章從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的原則，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濟改革作了一些理論上的說明。這篇文章算是對胡喬木談話的響應，但現在看來分析不深，說理顯得一般化，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影響。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月中旬，研究室領導讓我隨胡喬木到外地調查研究。行前到胡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他說，想到廣東做些調查研究，例如農村經濟和供銷社問題，看看城市在改革與開放中的新動向，也想想在那裡休息些時日。十一月三十日啓程。胡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按規定在列車上單掛一節車廂。同行的有他的秘書邱德新和警衛參謀魏建國。沿途無事，我在車上寫了一篇關於企業領導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準備好的。

在廣州停留兩天。十二月二日至三日，和先期到達的胡啓立、艾知生、彭鳳雲一同聽取關於廣東教育情況的彙報。十二月四日，胡喬木同胡啓立一行同車到深圳。廣東省副省長王屏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黃浩和胡喬木一行隨車到安南。胡喬木在列車上時時繼續地幾乎是一個人講了一路，談話內容現已毫無印象，好在我手頭保存一份省委宣傳部整理的紀錄稿，從中可以可以看出出關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他說：哲學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是要研究實際問題，二是要把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充實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裡去，不然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僵死的東西，成為教條。關於實際問題，他列舉了農村聯產承包制的研究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研究，認為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問題要按實踐加以正確的理解，而不是離開實際的空洞的解釋，不要說得大對絕對。關於學習自然科學知識，他列舉了信息系統、控制論和系統論，說社會主義社會許多發展規律是一個系統。胡啓立當時也是政治局委員，只是偶爾插話，其他同行者都沒有講什麼話。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時間，胡喬木召集市委組織部、宣傳部以及市總工會和共青團幹部開一次黨建問題座談會，參觀一個漁民村。村支部書記吳柏森說，全村一百四十七口人，過去人均收入三十元，現在增加到四百三十元，都蓋了新房，有兩間高檔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歷史見證。胡喬木向吳提了兩點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個人入黨，還是一個省內中等水平的漁民村結成姐妹村互相幫助。選拔村黨委委員應該是全體村民選舉出來的集體代表，要有權。

十二月六日，胡喬木和胡啓立一行同乘遊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遊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他休息，市領導來看和彙報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兩件小事使我至今記憶猶新：一件是，胡喬木到對賓館女服務員濃妝艷抹頗為不悅。

晚飯時拉着她們的手說：指甲塗成紅色或別的任何顏色我不管，但從餐館服務員這隻長的指甲是不衛生的，希望你剪掉。剪完指甲回來，胡又問：你們知道文天祥嗎？知道他寫的《過零丁洋》的詩嗎？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寫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後兵敗之地。幾個服務員對文天祥和他的詩毫無所知，瞪目結舌。胡不勝唏噓地說：人命來來紙草，當場寫出詩，逐句講解，還鼓勵她們「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務員座談時，考問的問題包括什麼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洲在哪个洲等等，都極其嚴肅認真而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遊樂場參觀，那裡有座當時國內還比較罕見的「過山車」。我怕眩暈，未敢奢望。年過古稀的胡喬木卻老當益壯，執意要去玩一把。因為這種娛樂太驚險，警衛隊員勸阻，執意說負責人不在此，打不贏。胡很不高興，背手獨自前行，低聲嘟囔道：「這班小人。」我很詫異，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滿。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

大約是十二月十四日離開珠海，經中山、江門、新會和佛山，沿途聽取當地領導彙報，參觀考察工廠和農村。胡喬木問了許多基層的具體問題，沒有作正式講話。在新會會了梁啟超故居和「小鳥天堂」。十六日抵達廣州，仍住珠江賓館。胡喬木在廣州逗留月餘，休息和治療眼疾。眼科專家、中山醫學院文書教授多次到賓館為胡喬木檢查。我也順便作了眼瞼檢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發覺的。

胡喬木對毛澤東有深厚感情。

在廣州期間，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感很感激地對我說起過：「文革」期間毛主席是保護他的，一九六七年「五一」節毛從天安門下，經過南長街時下車到家裡看他，家裡人沒有聽見敲門，沒有見成；說以後再來，但沒有再來。他們一直為此而遺憾。

或許是英雄常見凡人吧，我覺得胡喬木對毛澤東並不迷信，言談中經常有出人意料的評論。我向胡喬木問過一個長期困惑不解的問題：毛主席為什麼那麼重用陳伯達？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馬列主義文獻，我們的理論和政策的表達和馬列主義文獻相銜，需要陳伯達這樣熟悉馬列著作的人。別的人，譬如說我，當然不能說不熟悉，但畢竟不是科班出身。陳伯達在蘇聯學習過，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較好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毛主席需要這樣的人。

有一次，胡喬木問我：你讀馬列著作，哪一本收穫最大？我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列寧的《哲學筆記》；從一般著作中得到的啟發和結論，從這些筆記中得到的啟發和結論，說「哲學筆記」他讀過不止一遍，有同樣的感覺，但《剩餘價值理論》這樣重要的著作沒有讀過，回去一定要抽時間讀。胡喬木這樣居高臨下的大學問家，在我這樣一個晚輩面前，竟如此謙虛和坦率，增加了我對他的尊敬。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我問過胡喬木：為什麼在為蘇聯寫的《散生詩》寫的序言裡，說「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胡喬木說他的用意，並且講了蘇的坎坷經歷，對蘇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噓。我對他在序言裡所說的蘇詩「持不同看法，認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前途始終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認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無奈和強為笑顏。胡喬木對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未反駁，談話陷入沉默。根據我同他接觸的經驗，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時還不能或者不便明確表示態度。

胡喬木在廣州沒有再提起關於農村經濟和供銷社調查的事。十二月十一日在江門市，市委書記黎子流在彙報中曾說到農村調整承包土地，實現耕種適當集中的情況，胡喬木說：三中全會以後的分包，從抽象意義上說是退步，但從具體意義上說是大進步；現在農業面臨一個新的轉化，即新的集中，這也是進步。我覺得江門市的經驗可能顯示着農村經濟變化的新趨向，有理論和政策意義，便趁胡喬木休息的時間，在廣東省委農委副書記陪同下到江門做了包期的調查。回來向胡喬木彙報，他沒有表現出多大興趣，或許因為他的注意力已經轉移了。這份調查報告後來輾轉到分管農業的廣東省委常委杜德之手裡，他大為稱讚，並建議由省委轉發，推廣江門的經驗。

我於春節前夕返京，胡喬木則同家人和秘書、警衛去福建，在那裡過春節。

一八八一年農曆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此後，他在人間共度過五十六個中秋節。魯迅的中秋節，在他曲折的人生歷程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痕跡。

關於魯迅怎樣過中秋，可考的實據主要是魯迅日記。自一九二年起至一九三六年之間，魯迅的二十五個中秋，在其日記中有記錄的共二十二個，僅一九二八、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未會記及。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期間的魯迅中秋節通常是按規定休假期。獨在異鄉，中秋對魯迅而言更多的意味著懷鄉思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陰曆中秋也」；見月明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友仍以月餅配之。這十多個中秋，魯迅均未和家人團聚，而多是和朋友一起度過。

朋友相聚時也會給魯迅帶來點好心情，如一九一七年中秋，在紹興會館，「烹酒沽酒作餐，交同飯後去。月色極佳。一想必他當時情緒亦極愉快。但多數時候，魯迅的中秋節是落寞的，往往僅在日記中記以「舊曆中秋，休息」寥寥幾字。寫於一九一八年的小說《孔乙己》中的中秋節令人感到淒涼哀傷，「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而孔乙己也逐漸被那個冰冷的社會所遺棄。這或許是魯迅當時心境的一種反映吧。

一九二五年端午，魯迅和許廣平等人聚餐，魯迅喝得醉意朦朧，卻又頗感高興。於是他在致許廣平的一則詞「中」中約：「今年中秋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廟會，如有，我仍當請客。」許廣平在《兩地書》中曾特地憶起這年的中秋，那天她「遠遠提著四盞月餅，跑來地喝」。當年中秋節，且墨墨染染魯迅和許廣平如何飲酒、怎樣慶賀，似不足為奇。魯迅日記對此也並無詳述，但二人共度中秋，顯示出他們經歷了女師大風潮考驗的相濡以沫的真情，已足以坦然面對世間的一切險惡。

一九二六年，魯迅是在廈門度過的，和以往不同的是，魯迅又多了一重從未有過的牽掛——身在廣州中秋分食月餅的細節：他在日記中記述了中秋分食月餅的細節：「舊曆中秋也，月，語意適月餅一筐子住在國學院中，並中秋六枚多真以博取之。」同時他又在《兩地書》中提及此事。一九二七年的中秋，魯迅和許廣平已決意離開廣州，面對魯迅的舉行，魯迅滿腔悲憤。窗下，魯迅讀着《唐宋傳奇集》，又作了序，最後寫道：「時天夜彌天，壁月澄照，饕餮遂散，余在廣州。一可見雖身處危境，但魯迅從容鎮定，他是屹立于天地間、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真的猛士。

魯迅到上海後過中秋的情形迥然不同，隨着愛子周華，魯迅的中秋節也變得和過去有了不同的意義。魯迅的中秋節再不像過去那樣冷冷清清，不再是他心中的隱痛。一九二九年中秋，「午及夜皆添酒飲酒。次年同日，「煮一鴨及火腿，治饕餮平雨、雪峰及其夫人於夜間同食。」然而，在魯迅的九個中秋，魯迅日記反而三次未曾提及，而且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寫道，「傳是舊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廣平訪諸如及三弟，談至十一時而歸。」魯迅知道當時是中秋節，竟還是聽別人說起的，其實，親人就在身邊，摯愛就在身邊，幸福就在身邊，又何必總是記掛着中秋節呢？

一九三四年，魯迅作《中秋願》一文，提出了兩個發人深省的願望。願：從此不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二願：從此眼光離開開下三寸文學的走向也予以了深遠的期許。

一九三六年的中秋，距魯迅逝世僅十多天，那時他已身患沉疴，體重竟不足四十四斤。但當天，「曇、上、下午、午後、寄雪村信並校正稿。覆覆白信並三稿。下午、午後、生來診。晚臨如攜三孩來。夜三弟來。中秋。似發微熱。」魯迅直至人生最後的日子裡都未放下手中的筆。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瓦格納與拜羅伊特

林中南

十幾年來不斷地上演現代門恩恩。九月一日，這場權力之爭終於有了分曉，這齣「電視連續劇」最後以喜劇的形式收場——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妹共同主宰拜羅伊特。

理查德·瓦格納是德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為了他自己的音樂發揚光大，他在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資助下建了這座劇院。一八七六年該劇院落成首場演出時，德國皇帝威廉一世、巴伐利亞路德維希二世、李斯特、聖樂、柴可夫斯基等都參加了這一盛會，觀看了「尼伯龍根的指環」的演出。

瓦格納去世後，先是由他的妻子，也就是李斯特的女兒兒克司瑪掌管劇院，指導演出；然後是由他的獨子資料夫

利特接任，從一九三一年起，到一九四四年，拜羅伊特的掌門人是瓦格納的兒媳溫妮弗里德。

溫妮弗里德與希特勒之間的風流韻事是現代瓦格納家族最不樂意提及的一段歷史。一九三三年，溫妮弗里德與希特勒相識，同年，希特勒因政變被捕入獄，溫妮弗里德曾去獄中探望，並送給去紙張，希特勒就在這些紙上寫下了《我的奮鬥》。

希特勒上台之後，成了瓦格納家的常客，特別是每年的拜羅伊特音樂節的開幕式，更是少不了「元首」希特勒。據說，希特勒曾向溫妮弗里德求婚，儘管婚姻未成，但兩人之間的親密卻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一九八〇年去世，溫妮弗里德對希特勒仍是念念不忘。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魯迅的中秋節

成健

一八八一年農曆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此後，他在人間共度過五十六個中秋節。魯迅的中秋節，在他曲折的人生歷程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痕跡。

關於魯迅怎樣過中秋，可考的實據主要是魯迅日記。自一九二年起至一九三六年之間，魯迅的二十五個中秋，在其日記中有記錄的共二十二個，僅一九二八、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未會記及。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期間的魯迅中秋節通常是按規定休假期。獨在異鄉，中秋對魯迅而言更多的意味著懷鄉思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陰曆中秋也」；見月明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友仍以月餅配之。這十多個中秋，魯迅均未和家人團聚，而多是和朋友一起度過。

朋友相聚時也會給魯迅帶來點好心情，如一九一七年中秋，在紹興會館，「烹酒沽酒作餐，交同飯後去。月色極佳。一想必他當時情緒亦極愉快。但多數時候，魯迅的中秋節是落寞的，往往僅在日記中記以「舊曆中秋，休息」寥寥幾字。寫於一九一八年的小說《孔乙己》中的中秋節令人感到淒涼哀傷，「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而孔乙己也逐漸被那個冰冷的社會所遺棄。這或許是魯迅當時心境的一種反映吧。

一九二五年端午，魯迅和許廣平等人聚餐，魯迅喝得醉意朦朧，卻又頗感高興。於是他在致許廣平的一則詞「中」中約：「今年中秋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廟會，如有，我仍當請客。」許廣平在《兩地書》中曾特地憶起這年的中秋，那天她「遠遠提著四盞月餅，跑來地喝」。當年中秋節，且墨墨染染魯迅和許廣平如何飲酒、怎樣慶賀，似不足為奇。魯迅日記對此也並無詳述，但二人共度中秋，顯示出他們經歷了女師大風潮考驗的相濡以沫的真情，已足以坦然面對世間的一切險惡。

一九二六年，魯迅是在廈門度過的，和以往不同的是，魯迅又多了一重從未有過的牽掛——身在廣州中秋分食月餅的細節：他在日記中記述了中秋分食月餅的細節：「舊曆中秋也，月，語意適月餅一筐子住在國學院中，並中秋六枚多真以博取之。」同時他又在《兩地書》中提及此事。一九二七年的中秋，魯迅和許廣平已決意離開廣州，面對魯迅的舉行，魯迅滿腔悲憤。窗下，魯迅讀着《唐宋傳奇集》，又作了序，最後寫道：「時天夜彌天，壁月澄照，饕餮遂散，余在廣州。一可見雖身處危境，但魯迅從容鎮定，他是屹立于天地間、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真的猛士。

魯迅到上海後過中秋的情形迥然不同，隨着愛子周華，魯迅的中秋節也變得和過去有了不同的意義。魯迅的中秋節再不像過去那樣冷冷清清，不再是他心中的隱痛。一九二九年中秋，「午及夜皆添酒飲酒。次年同日，「煮一鴨及火腿，治饕餮平雨、雪峰及其夫人於夜間同食。」然而，在魯迅的九個中秋，魯迅日記反而三次未曾提及，而且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寫道，「傳是舊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廣平訪諸如及三弟，談至十一時而歸。」魯迅知道當時是中秋節，竟還是聽別人說起的，其實，親人就在身邊，摯愛就在身邊，幸福就在身邊，又何必總是記掛着中秋節呢？

一九三四年，魯迅作《中秋願》一文，提出了兩個發人深省的願望。願：從此不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二願：從此眼光離開開下三寸文學的走向也予以了深遠的期許。

一九三六年的中秋，距魯迅逝世僅十多天，那時他已身患沉疴，體重竟不足四十四斤。但當天，「曇、上、下午、午後、寄雪村信並校正稿。覆覆白信並三稿。下午、午後、生來診。晚臨如攜三孩來。夜三弟來。中秋。似發微熱。」魯迅直至人生最後的日子裡都未放下手中的筆。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簽證與夢斷

陳安

我和內子此次的歐洲之旅籌劃已久。按計劃，我們將隨歐洲「寰球巴士」旅行團前往丹麥、瑞典、芬蘭、俄國、白俄羅斯、波蘭和德國。一到哥本哈根，導遊就將我們的護照收去，要給我們辦俄國簽證。——為我們安排這次旅行的紐約自由旅行社疏忽了他們的責任，現需緊急辦理。第二天，導遊把護照退給我們，無奈地說，辦俄國和白俄羅斯簽證共需繳三百五十美元，緊急辦理要加倍，可現在的情況是連急辦也不成了，因兩國使館辦緊急簽證需十個工作日，而旅行團在北歐三國只逗留五天就進入俄國。

顯然，俄羅斯是去不成了。當夜，我這個不大失眠的人失眠了，一則因時差，二則是因心情。我深感掃興，失望，甚至悲哀。我們自己有責任。自由旅行社責任更大，因為他們明明告訴我們說，去俄國和白俄羅斯也不需要簽證。而使我覺得悲哀的是，儘管冷戰結束已久，俄國與美國卻仍然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彼此依然在猜忌、警戒、防範，還不願意互相敞開國門，讓兩國人民自由往來，所以辦一個簽證就那麼困難，就需要十個工作日、也即兩周的時間來調查、審核一個普通的旅行者。據說，俄國需要兩周，是為了跟美國需要的日子對等。就這樣，對我們而言，已經近在咫尺的俄羅斯一下子又顯得十分遙遠，又像在蘇聯歌曲裡所唱的，「遙遠，遙遠」，「在那遙遠的地方」。

在那失眠之夜，我想得很多。我想起自幼一懂事就知道世界上有個「老大哥」，「老大哥」有「阿美利加爾」巡洋艦，有多宮和克里姆林宮。小學裡就誦讀《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學裡最崇敬保爾·柯察金、卓婭和舒拉、馬特洛索夫、邱列寧和他的青年近衛軍。自己大學的專業就是俄羅斯語言，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使用過的語言。一生唱得最多的大外國歌是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歌曲。個人心緒也隨反修、珍寶島和解體等一系列政治風波上下起伏。是的，這就是「俄羅斯情結」，我的半個世紀的「俄國夢」，而眼看著這個夢就要變為現實的時候，卻忽然又破滅了，這就不讓我失眠嗎？能不讓我感到「夢斷」的沮喪嗎？

後來通過導遊的聯繫，北歐三國之行結束後，我們飛往慕尼黑，與「寰球巴士」另一個旅行團會合，開始了十天的德國和奧地利之行。在心情好轉之後，我忽然覺得這次的夢雖然斷了，但今後還是可以再轉一次，並且提醒紐約自由旅行社，美國與俄國之間能自由旅行，千萬不要忘了為我們到俄國領事館去辦簽證。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瓦格納與拜羅伊特

林中南

十幾年來不斷地上演現代門恩恩。九月一日，這場權力之爭終於有了分曉，這齣「電視連續劇」最後以喜劇的形式收場——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妹共同主宰拜羅伊特。

理查德·瓦格納是德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為了他自己的音樂發揚光大，他在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資助下建了這座劇院。一八七六年該劇院落成首場演出時，德國皇帝威廉一世、巴伐利亞路德維希二世、李斯特、聖樂、柴可夫斯基等都參加了這一盛會，觀看了「尼伯龍根的指環」的演出。

瓦格納去世後，先是由他的妻子，也就是李斯特的女兒兒克司瑪掌管劇院，指導演出；然後是由他的獨子資料夫

利特接任，從一九三一年起，到一九四四年，拜羅伊特的掌門人是瓦格納的兒媳溫妮弗里德。

溫妮弗里德與希特勒之間的風流韻事是現代瓦格納家族最不樂意提及的一段歷史。一九三三年，溫妮弗里德與希特勒相識，同年，希特勒因政變被捕入獄，溫妮弗里德曾去獄中探望，並送給去紙張，希特勒就在這些紙上寫下了《我的奮鬥》。

希特勒上台之後，成了瓦格納家的常客，特別是每年的拜羅伊特音樂節的開幕式，更是少不了「元首」希特勒。據說，希特勒曾向溫妮弗里德求婚，儘管婚姻未成，但兩人之間的親密卻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一九八〇年去世，溫妮弗里德對希特勒仍是念念不忘。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演員張瑞芳、趙子岳，到住地看望胡喬木。胡向他們祝賀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成立，說明沒有得到開會的消息，否則是一會去參加的。他談到不少電影和關於電影的文章，也說到一些演員，講了不少很專業的意思，顯然對電影界的情況很熟悉。他說：中國電影不論三十年的，五十年的，都有獨到之處。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在不斷進步中。譬如《茶館》，如果不出國演出，在國外得到好評，國內不會有那麼大影響。電影也要出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中國電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國人無論如何演不出中國電影的真實來。又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的真實要跳出生活的真實，這就要勇氣。藝術作品往往有不真實的東西，譬如《巴黎聖母院》，很難說有多少真實性，但不能否定它較優秀作品。藝術作品有時候創造一種境界，使人不去計較具體的真實。丁、張、趙聽得入神，頻頻點頭稱是。次日晚，胡喬木到中山紀念堂觀看演出，休息時間會見了張瑞芳、秦怡等電影演員。這次談話，我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

在廣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喬木在院散步。散步時的談話是隨意的，或者可以稱作「散話」，不連貫，沒有主題，漫無目的，零零碎碎，內容涉及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學的廣泛領域，以及許多歷史和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許多說法，見所未見，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真是受益匪淺。他對西方文學很熟悉，對黨的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見聞。在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三年，胡喬木已經去世十有餘年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每每後悔當時太過拘謹，沒有能夠趁機向他提更多的問題，學更多的東西。

胡喬木致作者信（一九八五）

胡喬木

二月十三日胡喬木致作者信，請上、中、下三冊，如有可能，請將原稿寄回，以便整理。如有可能，請將原稿寄回，以便整理。如有可能，請將原稿寄回，以便整理。

「後來還是做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才算轉輿為喜。」（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州參加中國電影表演藝術研討會的文化部副部長丁驥和電影